

他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36岁便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被美国人称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他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孜孜追求以“两弹一星”为重要标志的新中国“强国梦”,坚信“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他就是钱学森。



王德蓉

改行投身航空业

1947年2月,刚满36岁的钱学森因在空气动力学、火箭飞行理论、数学等领域的优异才能,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每个系一般只有2-3名终身教授,而且是担任副教授不少于3年的人。而钱学森只当了1年的副教授,并且是第一个走进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行列的中国人。

令人惊讶的是,钱学森在大学学的专业并不是航空工程,而是铁道工程。1929年,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道工程专业。1934年夏,23岁的钱学森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报考清华大学公派美国留学,争取到“航空门”唯一的一个名额,从此“改行”。

钱学森的“改行”不是偶然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已开始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上海又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军的狂轰滥炸让钱学森痛心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航空工业,中国只能任人欺负。国难当头,他毅然决定改变学习方向,投身航空工业。

在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36年,他又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工程理论和应用力学的学习研究。他和冯·卡门共同创造的著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在航空科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时的钱学森,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漫漫五年归国路

然而,他的回国之路,却是那样的艰辛。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离开美国。但是,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

了他。美国当局深知钱学森的价值,当时的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说“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共产党中国”。美国政府先是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逮捕监禁他,最后竟然软禁他。



毛泽东宴请回国后的钱学森

5年岁月并没有摧垮钱学森的铮铮铁骨。一部30万字的《工程控制论》在软禁中问世,成为这个领域中奠基式的著作。他一方面继续自己



钱学森携家眷归国

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寻找回国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同年6月,他避开盯梢,通过一张小香烟纸,寄托了恳请祖国助他还乡的深情。这封信先传到在比利时的蒋英的妹妹手中,再传到在北京的陈叔通手中,最后传到周恩来总理手中。8月1日,王炳南大使在日内瓦中美会谈上出示钱学森的信,美方无奈只好允许钱学森离开。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

朗朗获任联合国和平使者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近日任命中国著名钢琴家朗朗为关注全球教育的联合国和平使者。朗朗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联合国和平使者。据悉,联合国和平使者都是从艺术、电影、文学、音乐和

体育领域精挑细选的杰出人士,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现任其他联合国和平使者还包括美国演员乔治·克鲁尼、约旦公主哈娅·宾特·侯赛因、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等。

阮煜琳摄影报道



终于回到他魂牵梦绕的祖国。

开创两弹一星伟业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面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作出发展“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那个年代,我国物质技术基础非常薄弱,人才极度匮乏,现代科学技术远比欧美发达国家落后,火箭、导弹在我国还是个新生事物,只有少数几位留美、留苏的科学家做过一些研究工作。钱学森作为世界公认的火箭、导弹技术专家,担任了“两弹一星”工程中导弹、卫星工程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勇敢地承担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责任。他坚信:“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他带领初创时仅有175人的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攻克了数千个重大技术难关,参与组织指挥了诸多型号的导弹研制工作。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当“东风一号”“精确命中目标”的报告传来时,这位曾经在美国被无数次鲜花、笑脸、掌声、地位、荣誉簇拥都没掉眼泪的著名科学家,激动得泪水纵横。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仅用10多年时间,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就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达到了世界上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所具备的实力和水准。

神韵

七八块钱的布鞋,大众品牌的棉衣,脖子上的围巾总是个名牌,可是已经被搓揉得没有样子了。近年来,陈佩斯一头扎进舞台,似乎与周边的环境“绝缘”了。临近年底,又到了北京喜剧艺术节要登台的时候了,为了这个他一手拉扯起来的“宝贝儿子”,陈佩斯总会勉为其难地多露几次面。

像个农民那样躬耕舞台

往届北京喜剧艺术节,资金全部都由陈佩斯的大道文化包揽,“个人力量有限,办一次就很耗元气,所以都得隔两年攒够了钱再办一次。”今年6月的京交会上,他与北奥签约,合办今年的北京喜剧艺术节,这才有点儿“排场”。

这些年,陈佩斯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舞台和他的喜剧理论研究中。他带着十几个学生,像个认真的农民那样仔细地躬耕,“每年春天、夏天创作排戏、培训,秋天、冬天演戏,这就是我的全部。”舞台这块土地没有辜负他的劳作。陈佩斯说,他租下的两个小剧场已经能够达到收支平衡,“这批年轻人每天在小剧场演出,用他们自己微薄的演出收入去养剧场,养他们自己,能够做到这些很不容易。”

对于陈佩斯来说,舞台是他实践喜剧理论的实验田。谈起喜剧,他俨然是个艺术理论专家。“以前我认为喜剧的条件是悲情的内核,并由此提出了我的‘差势说’,去年我又发现了新的喜剧条件,那就是对行动的悖逆,小到一包袱,大到大的事件和一个人行动,都是由悖逆条件产生的。它怎样出现,怎样铺垫,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喜剧结构标准和条件。”

这个听上去学术色彩甚浓的新发现,让陈佩斯倒抽了一口凉气:“它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可我却刚

书评是社会良心、审美尺度、人文精神的综合表现。没有书评,出版和阅读就会变成一个自生自灭的领域;没有美学标准和观念因素的介入,社会就会变得不可想象。

——作家白烨担忧书评的减少。



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可以说是“甚嚣尘上而迷雾重重”,跟风写作、跟风出版很严重。儿童作家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学抱负与艺术尺度,不要为利益诱惑所动。

——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说。



小剧场话剧应当是实验戏剧的代名词,而非在小剧场演出的话剧。虽然精神特质不唯一,但它应是一场非主流的实验活动。它不应沦为饭后甜点,而应是提供给人精神的主食。

——导演孟京辉认为。



作家应该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写出时代的气息。时代精神是绕不开的主题。写好这个时代就是作家的责任,必须写出时代背景下的国情、民情和事情,这样的故事才是中国故事。

——作家贾平凹认为。



网上有所谓的“文学”其实并非文学,只能视为“网络文字”。真正的网络文学要有出路和前途,必须理清文字与文学的差异,清除那些低俗的、丑恶的甚至是反动的“网络文字”。

——作家何建明说。

用娱乐节目做公益非常考验创新能力。之前出现的娱乐归娱乐、公益归公益的“两张皮”现象,就是因为创作者不相信公益的力量,玩各种技巧。殊不知,惟有诚心诚意,才能打动人心。

——尹鸿教授认为。



我们越说越多,越加越多,就像人不断地汲取营养,太多了之后,就会产生肥胖、高血压、高血脂。中国文化也是一样,需要减减肥了!

——学者余秋雨呼吁。



非常好声音

社会科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要有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敏感,要有志在富民的热情,但又必须坚持让事实说话,不能用原则裁剪事实。

——社会学家李培林表示。



(苏亚群)

这么多年,陈佩斯以一个令人捧腹的形象被人们牢牢记住,他已经把喜剧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除了这件事,他明确表示不会去尝试其他的工作:“喜剧我还没闹明白呢,不会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去做别的。”



刚才发现,那就是说,可能还会有更重要的东西我还没有发现。”

陈佩斯

为

喜剧

而生

牛春梅

真的没时间去上春晚

陈佩斯塑造的很多经典喜剧形象,都是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为观众熟知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每到年底这个时候,总会有记者不厌其烦地向他打听,还不上春晚?时间长了,陈佩斯也有些无奈,只能一笑置之。今年又有消息称,朱时茂收到央视春晚的邀请,但闭口不提陈佩斯是否会去上春晚。“这小子,他是故意留一个活扣!”对于老搭档的“狡猾”,陈佩斯早已了解,不以为然。但他自己的态度很明确:春晚肯定不去,没时间。

虽然舞台很小众,但陈佩斯并不留恋电视荧屏的繁华。“喜剧艺术节从策划、排演再到演出就得整整一年的时间,真的没时间参加春晚。知名度什么的也无所谓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能够承受后果。”



即使偶尔回到影视圈,陈佩斯也是另有一番考虑。明年初,由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视剧《好大一个家》将开播,对于这次重又涉足影视圈,陈佩斯说:“我只想论证一下长篇结构喜剧的可能性,是为了完成自己关于喜剧理论的一个验证。”

(据《北京日报》报道)